

书的介绍

这本书写于1985年，中文版，那个时候还没有互联网，美国的电视是当时社会流行的娱乐方式，作者通过观察这些现象，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批判，现在这些

完整内容（部分章节内容）的简介【必须】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

——尼尔·波兹曼

《娱乐至死》初版于1985年，是尼尔·波兹曼的代表作之一。

电视时代蒸蒸日上，电视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政治、宗教、教育、体育、商业和任何其他公共领域的内容，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而人类无声无息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心甘情愿，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乔治·奥威尔曾在《一九八四》中预言人类将会遭受外来压迫，失去自由；赫胥黎则在《美丽新世界》中表达了另一种忧虑：人们会渐渐爱上工业技术带来的娱乐和文化，不再思考。

《娱乐至死》想告诉大家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不是奥威尔的预言；毁掉我们的，不是我们憎恨的东西，恰恰是我们热爱的东西！

作者和出版年份，版本等等基本信息【推荐填写】

作者 [美] 尼尔·波兹曼(<https://book.douban.com/author/4522294>)

出版年份

原版 1985年
中译本 2015-5

出版信息

第一版

吸引你的地方【可选】

对流行和泛娱乐文化的探究和批判

你推荐的理由【可选】

1 反思当下的娱乐为主要文化的社会

你准备展开的几个话题及你的主要观点【推荐填写】

这些话题可以是书里书外都行，但是应该跟这本书有明确的关系。

话题 1

为什么新媒体平台和内容看起来容易肤浅

观点

新媒体的技术、效果和受众决定了它在当前阶段注定流于表面，引发社会思想和娱乐方式的巨大转变。

媒介即隐喻

在2005中文年翻译的，原著写于1985年的《娱乐至死》这本书里，第一章即“媒介即隐喻”，这是一个非常晦涩的标题，整本书的翻译是通俗而流畅的，所以基本上不用怀疑是翻译的问题，而书本书即讨论了一些非常深刻的事实而让内容一下子那么通俗易懂。

何谓隐喻？隐喻着什么，这是我最开始的问题。

媒介从本质上都是一个信息的搭载渠道而已，为什么会成为隐喻呢？让我们大胆的猜想一下，因为媒介，即纸媒，电视，网络喝社交网站，他们这些媒介本身，已经在信息传递给我们的时候，已经大致确定了接下来发生的事，即你可以想象，考虑一下交通工具，飞机坐的是长途而赶时间的旅客，高铁坐的是追求舒适和性价比的相对富裕或者不是那么在乎钱的人，从矿产资源丰富的地方发出的货运列车肯定拉的是一车车煤矿或者其他矿产，那么电子产品上的传递的信息呢？也有可能逃不出这个命运。一个最热闹的开放式社交网络必然充斥着绯闻和最新的商业财经消息，最爆炸的时政和战争新闻等等，而深夜广播则会讨论男女情爱和心理情感疑惑解答等等，有名气的出版社出版的书籍会承载变化相对慢和严肃的内容，这一切都说明了一点，不同的媒介会倾向于承载某一类信息，即媒介就是一种隐喻。

为什么会这样？

每一种媒介都有一种特质，每一种信息也有一种特质，当它们完美的匹配并且人们习惯于这种匹配的时候，就形成了一种隐喻，或者说一种刻板印象。想象一下，如果在一个通信如此发达的时代，还有人坚持纸质的写信，要么这个信息很重要，要么这个人很古板，要么最新的通信技术无法通达等等，它们都暗示着一些东西。当我们接受一种媒介的时候，也暗含了我们可能接受某一类信息，即虽然媒介传递着信息，但是媒介也已经控制了信息，而从媒介可能控制了消费信息的人。这样的结论绝非危言耸听。

我们和工具的关系是双向的，而非单向的。我们发明了技术，技术也塑造了我们，我们是时时刻刻和技术博弈的，技术带给我们方便的同时，也培养了我们的懒惰，技术给我们方便的同时，也让我们离不开技术。所以，我们和技术形成了一种共生以及互相塑造的关系。

在媒体和信息的关系上，同理。

在现实中，我们往往在消费信息上，忽略了媒介本身，即没有注意到媒介对我们自身的影响。

书中举了几个例子，比如我们发明了钟表，我们方便地获取了时间，但是我们从此也要严格的遵守时间，我们必须经常带着手表和其他有钟表功能的器具，随时获得时间，即我们困在了时间里。时间到底存不存在？目前来看，正是因为有了钟表才有了时间，或者说让人意识到了有时间这个东西。如果没有钟表，在古代，人们只能看影子来大概定个时间，生活的懒散而自由，而有了时间之后，必须精确而严谨。更不要说现在的智能手机了。

书写也带来了知识传播革命性的变化。

下文中的括号是我直接摘录原文用的，因为原文已经非常好了，我没有任何理由去再二次阐释，我想为了让读者看到原汁原味的行文，我即便侵犯版权也在所不惜。

【

字母带来了人与人之间对话的新形式，关于这一点，如今学者们已达成共识。人们说出的话不仅听得见，而且看得见——这不是一件小事，虽然关于这一点，我们的教育也未做太多评论。但是，很明显，语音的书写形式创造了一种新的知识理念，一种关于智力、听众和后代的新认识，这些东西柏拉图在其理论形成的初期就已经认识到了。他在《第七封信》中写道：“没有一个有智力的人会冒险用语言去表达他的哲学观点，特别是那种会恒久不变的语言，例如用书面的文字记录下来。”他对此进行了详尽的阐述，他清楚地认识到，用书面文字记录哲学观点，不是这些观点的终结，而是这些观点的起点。没有批评，哲学就无法存在，书面文字使思想能够方便地接受他人持续而严格的审查。书面形式把语言凝固下来，并由此诞生了语法家、逻辑家、修辞学家、历史学家和科学家——所有这些人人都需要把语言放在眼前才能看清它的意思，找出它的错误，明白它的启示。

】

【柏拉图深知这一点，他知道书写会带来一次知觉的革命：眼睛代替了耳朵而成为语言加工的器官。相传，为了鼓励这种变化，柏拉图要求他的学生在来他的学园之前先学习几何学。如果确有其事，柏拉图就确实很明智，因为正如伟大的文学批评家诺思罗普·弗莱所说的：“书面文字远不只是一种简单的提醒物：它在现实中重新创造了过去，并且给了我们震撼人心的浓缩的想象，而不是什么寻常的记忆。”

】

柏拉图自己写了一本书，《理想国》，而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则没有亲手写自己的著作。

【把诸如文字或钟表这样的技艺引入文化，不仅仅是人类对时间的约束力的延伸，而且是人类思维方式的转变，当然，也是文化内容的改变。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把媒介称作“隐喻”的道理。

】

一个媒介的引入带来的远远不止它当下带来的东西，即它当下带来的东西只是开始，好戏还在后面呢。正如说，一叶知秋，落叶隐喻着秋天，其余的很多东西的隐喻是什么，需要当事人去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把媒介称作“隐喻”的道理。在学校里，老师非常正确地告诉我们，隐喻是一种通过把某一事物和其他事物做比较来揭示该事物实质的方法。通过这种强大的暗示力，我们脑中也就形成了这样一个概念，那就是要理解一个事物必须引入另一个事物。

我们这种媒介—隐喻的关系并没有如此明了和生动，而是更为复杂。为了理解这些隐喻的功能，我们应该考虑到信息的象征方式、来源、数量、传播速度以及信息所处的语境。例如，钟表把时间再现为独立而精确的顺序，文字使大脑成为书写经历的石碑，电报把新闻变成商品。要想深刻理解这些隐喻，我们确实要费些周折。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我们创造的每一种工具都蕴含着超越其自身的意义，那么理解这些隐喻就会容易多了。例如，有人指出，12世纪眼镜的发明不仅使矫正视力成为可能，而且还暗示了人类可以不必把天赋或缺陷视为最终的命运。眼镜的出现告诉我们，可以不必迷信天命，身体和大脑都是可以完善的。我觉得，如果说12世纪眼镜的发明和20世纪基因分裂的研究之间存在某种关联，那也不为过。

】

【

如果事物总是不同于它的表象，如果微生物不可见地隐藏于我们的皮肤内外，如果隐形世界控制了有形世界，那么本我、自我和超我是否也可能不可见地隐藏在某个地方？精神分析除了充当大脑的显微镜之外还有什么？我们对于大脑的理解除了来自某些工具所产生的隐喻之外，还有什么途径？我们说一个人有126的智商，又是怎么回事？在人们的头脑里并不存在数字，智力也没有数量和体积，除非我们相信它有。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相信它有呢？这是因为我们拥有可以说明大脑情况的工具。确实，我们思想的工具能帮助我们理解自己的身体：有时我们称自己的身体为“生物钟”，有时我们谈论自己的“遗传密码”，有时我们像看书一样阅读别人的脸，有时我们用表情传达自己的意图。

伽利略说过，大自然的语言是数学。他这样说只是打个比方。大自然自己不会说话，我们的身体和大脑也不会说话。我们关于大自然以及自身的对话，是用任何一种我们觉得便利的“语言”进行的。我们认识到的自然、智力、人类动机或思想，并不是它们的本来面目，而是它们在语言中的表现形式。我们的语言即媒介，我们的媒介即隐喻，我们的隐喻创造了我们的文化的内容。

最后一段我读的似懂非懂，但是我从中悟到了一个振聋发聩的观点，一切皆可怀疑，我们接受的和认可的以及以此来交流的并不是事物的本源，只是我们用来表达的一种方式而已，如果我们把这些表面的东西当作本源，可能会限制我们的认识和带给我们错误的行为。我当然不是说，怀疑一切，因为无序和怀疑会带来混乱，我们尊重现有的认识，但是我们必须明白其背后的逻辑。

娱乐业时代

第六章 娱乐业时代

{
举这些例子，我是想嘲笑那些妄想利用电视机来提高文化修养的人。这样的愿望正是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说的“后视镜”思维：认为一种新媒介只是旧媒介的延伸和扩展，比如汽车只是速度更快的马，电灯是功率更大的蜡烛。在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中，这种人犯的错误就是完全误解了电视如何重新定义公众话语的意义。电视无法延伸或扩展文字文化，相反，电视只能攻击文字文化。如果说电视是某种东西的延续，那么这种东西只能是19世纪中叶源于电报和摄影术的传统，而不是15世纪的印刷术。
}

{
在看美国电视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想到萧伯纳第一次看见百老汇和四十二大街上夜间闪烁的霓虹灯时发表的精彩评论。他说，如果你不识字，这些灯光无疑是美丽的。美国的电视确实是美丽的奇观，是难得的视觉愉悦，每天你都能看见成千上万个图像。电视上每个镜头的平均时间是3.5秒，所以我们的眼睛根本没有时间休息，屏幕一直有新的东西可看。而且，电视展示给观众的主题虽多，却不需要我们动一点儿脑筋，看电视的目的只是情感上得到满足。就连很多人都讨厌的电视广告也是精心制作的，悦目的图像常常伴随着令人兴奋的音乐。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说，世界上最美的照片是出现在电视广告里。换句话说，美国电视全心全意致力于为观众提供娱乐。当然，电视具有娱乐性这个事实实在太苍白了，绝对不会对文化造成任何威胁，也不值得我为此写一本书。电视有时甚至是让人们高兴的一个理由。我们经常说，生活不是铺满鲜花的阳光大道，能在途中偶尔看见一些花朵，会使旅途变得不那么难以忍受。拉普人无疑就是这样想的，每天晚上观看电视的9000万美国人可能也是这样想的。但我这里想要说的不是电视的娱乐性，而是电视把娱乐本身变成了表现一切经历的形式。我们的电视使我们和这个世界保持着交流，但在这个过程中，电视一直保持着一成不变的笑脸。我们的问题不在于电视为我们展示具有娱乐性的内容，而在于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

为什么电视，电影，短视频必然整体流向媚俗？
媒体没有媚俗，媒体只是反映了整个世界，这个世界本来就很俗。但是，这么说也不全对，因为媒体平台它也是一个战场，掌握话语权会干扰到对此类内容不感兴趣的人，比如拥有很多粉丝，总能制造热门话题等等，这些平台就把最热门的放到最入口的位置，获得入口最多的注意力，就像书的封面让人不能忘记一样。入口时候一两个，而争夺入口就成了关键，争夺入口的位置是有规律可循的，比如最让人好奇的事情，最通俗易懂的事情，最娱乐的事情，即多数人多数时候最容易关注的事情，它必然要浮于表面，具有绝大多数人的可理解性和可聊性，所以首页是最嘈杂的地方，最不宜常待的地方，这个地方会让人丧失主动思考和主动选择、失去自我内心世界构建的机会。去首页越多，内心就越浮躁，被外界的喧嚣所同化而失去自我的独特与魅力，我们要做的就是主动而且适度的自我隔离。

一切皆可直播和成为新闻？

让我们来想象一个事情，一个伟大的科学家死去，现在这件事成了一个新闻，这个可能没问题。如果一次外科手术被直播，一个案件庭审被直播？直播固然能满足人们窥探的好奇心，有些东西本身却是私密和严肃的，直播和新闻会让事情变的充满娱乐性，因为我们总是知道，有的新闻频道上经常播放搞笑和随便的内容，它变成一个非严肃场合，人们很容易把其频道特点和播报内容绑定起来。

很多东西让大众观看，他们发出的互动的声音很嘈杂，，甚至会影响被直播的内容本身。

举个例子，一头驴，一对父子，谁骑驴的问题就很搞笑。

小心那些没有门槛的东西。

教育的游戏化？

我们渴望游戏的轻松愉快，讨厌教育的枯燥乏味，所以想把两者结合起来。但是，教育本身有的时候就是对人的一种历练和折磨，换句话说，痛苦的教育过程才更像教育，它是人生经历的诸多痛苦的第一关。如果你要选择轻松愉快的教育，那么它的背后是精心设计与丧失选择，即你为了安逸而放弃了诸多可能性，而且需要知道的是，寓教于乐是需要花费非常大的精力成本的。然而，我们必须走高质量的教育，即高质量的教育不等于寓教于乐的教育，过时的教材和糟糕的讲师以及授课不是我们必须的挫折教育。

愉快的体验夺走了更多必要的注意力

{ 在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从芝加哥飞往温哥华的飞机上，一个乘务员小姐宣布旅客要做一个游戏。飞机上持有最多信用卡的旅客将赢得一瓶香槟，结果一个来自波士顿的男子以12张信用卡取胜。第二个游戏要求旅客们猜出机组成员年龄的总和，一个来自芝加哥的男子给出128岁的答案，拿走了第二瓶香槟。在第二个游戏过程中，天气情况开始恶劣起来，“系安全带”的指示灯亮了起来，但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而乘务员们忙着通过对讲机说笑话，更是一点儿没有察觉。飞机到达终点的时候，机上的每个人都觉得从芝加哥飞往温哥华的旅途实在太愉快了。

}

吃饭的时候看手机，大致同理。

政治的肤浅趋向

{

当今所有的总统竞选中，两个竞选人都会在电视上进行所谓的“辩论”，但这些辩论与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辩论根本无法同日而语，甚至根本不算什么辩论。每个竞选人有5分钟时间回答诸如“你对中美洲将采取什么政策”这样的问题，然后他的对手可以做1分钟的反驳。在这种情况下，复杂的措辞、充分的证据和逻辑都派不上用场，有时候连句法也被丢到一边。但这没有关系，他们关心的是给观众留下印象，而不是给观众留下观点，而这正是电视擅长的。辩论后的综述通常避免对竞选人的观点进行评论，因为确实也没什么可以评论的。这样的辩论就像是拳击比赛，关键的问题是“谁打倒了谁”，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则取决于竞选人的“风格”——他们的外表如何，他们的眼神如何，他们怎样微笑，怎样说俏皮话。当年在里根总统与弗里茨的第二场辩论中，里根总统在被问到年龄时说了一句极精彩的俏皮话，结果第二天有好几家报纸都透露里根用他的笑话击败了对手弗里茨。由此可见，自由世界的领导人是电视时代的人民选择的。

}

{

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一点，那就是我们的文化已经开始采用一种新的方式处理事务，尤其是重要事务。随着娱乐业和非娱乐业的分界线变得越来越难划分，文化话语的性质也改变了。我们的神父和总统，我们的医生和律师，我们的教育家和新闻播音员，都不再关心如何担起各自领域内的职责，而是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了如何让自己变得更上镜。欧文·伯林有一首著名的歌，只要改掉歌名中的一个词，他就会成为像奥尔德斯·赫胥黎那样的先知。他应该这样写：除了娱乐业没有其他行业。

}

```
{
你要为节目选择一个音乐主题。所有的电视新闻节目的开始、结束或中间都要插入一段音乐。我发现很少有美国人会觉得这样的做法奇怪，这足以证明严肃的公众话语和娱乐之间存在的分界线已经荡然无存。音乐和新闻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播放音乐？我想，这可能是和在戏剧和电影中使用音乐的道理是一样的——制造一种情绪，为娱乐提供一个主题。
}
```

大众网络空间的荒漠

我从印刷书籍和正式出版物上学到了构建我知识体系的骨架和智慧，但是在电脑和网络上的信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们大多数是零碎的和及时的时事新闻，生活小知识，搞笑视频，影视剧。我从网络和电脑上得到了焦虑，我却要依靠线下去消化它。

以朋友圈为例，我持批评态度，但是我暂时找不到可以替换的工具，因为我对当下世界持有独特的观点，我不喜欢过度的消费，游玩和炫耀，我觉得我不应该出现在朋友圈，这片虚拟空间让我难受，我从中获取了1倍的收益，获取了3倍的时间精力情绪浪费。对于我，我下定决心要去寻找自己的一片精神家园，而不会再借助于朋友圈的宣传功能。它封闭，它也庸俗，每次逛完，我大多数时候感觉无用，无聊。

第五章里提到一句名言，到处是水，却没有一滴可以喝。在信息的海洋里，找不到一点有用的信息。

还说了个现象，电报可能已经使这个国家成为“一个社区”，但这个社区却是奇怪的，因为这里住着一群除了了解一些最表面的情况外彼此之间几乎一无所知的陌生人。

彼时的电报也如同今天的互联网。是时候改变了。

教育能很轻松吗

```
{
《咪咪见闻录》按照媒体商人的旨意，盲目而无形地花掉了365万美元，结果学生们学到了什么呢？可以肯定，他们对鲸鱼有了一些了解，也许也获得了有关航海和识别地图的知识，但这些他们也完全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最重要的是，他们知道了学习是一种娱乐方式，或者更准确地说，任何值得学习的东西都可以采用娱乐的方式出现，而且必须这样。
}
教育的改良有无意义？
蠢货就是蠢货，聪明人自是聪明人。
现在的就是最好的。

```

```
{
如果他们的英语老师让他们通过摇滚音乐学习演讲稿的八大部分，或者，如果他们的社会学老师用唱歌的方式教给他们有关1812年战争的史实，又或者，如果他们的物理课内容出现在饼干和广告衫上，他们绝不会有异议。正是他们希望的，而且他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要以同样轻松愉快的方式来接受他们的政治、宗教、新闻和商业。
}
{
“研究表明，当信息通过戏剧化的形式表现出来时，学习的效果最明显，电视在这方面可以比任何其他媒介都做得更好。”对于这样的观点，我们最厚道的反应是说它误导人心。乔治·科姆斯托克和他的助手们认真分析了2800项有关电视对行为的影响的研究，包括对认知过程的影响，没有找到让人信服的证据可以证明：“当信息通过戏剧化的形式表现出来时，学习的效果最明显。”
}
```


{
雅各比和其他一些人发现，在观看了两个30秒长的商业电视节目和广告之后，只有3.5%的观众可以正确回答和节目有关的12个判断对错的问题。斯托弗和其他一些人在研究了学生对电视、广播和报纸上的新闻做出的不同反应后得出结论：学生对于报纸新闻中出现的人名和数字做出的回答正确率最高。斯特恩的研究结果表明，51%的观众在看完一个电视新闻节目几分钟之后无法回忆起其中的任何一则新闻。威尔逊发现，普通的电视观众只能记住电视剧中20%的信息。卡茨和其他一些人发现，21%的电视观众无法回忆起一个小时之内播放的任何新闻。在他自己以及其他人的研究基础上，萨洛蒙得出一个结论：“从电视上获得的意义往往是一些具体的片断，不具备推论性，而从阅读中获得的意义往往和我们原来储存的知识相关，所以具有较强的推论性。”换句话说，通过这一系列的研究，我们没有发现观看电视可以有效地提高学习效果，电视在培养深层次的、具有推论性的思维方面明显不如铅字。
}

{
吸引学生兴趣的主要途径是娱乐。
}

教育本身令人沮丧和痛苦的事实
有知识阶梯和前提条件
容易让人困惑。对一个公理定理的跳跃性解释和引入往往让人苦恼不已。学习本身不容易
概念的阐释和复杂的逻辑推理以及演绎。

{
指出的第一点是，电视对教育哲学的主要贡献是它提出了教学和娱乐不可分的理念。从孔子到柏拉图到洛克到杜威，没有人在他们对教育的论述中提出过这样的观点。如果你博览教育文献，你会发现有人说过，孩子在学习自己有兴趣的东西时掌握得最好；你还会发现有人说过——柏拉图和杜威对此也十分强调——理性只有在情感的肥沃土壤里才能得到最好的培养；你甚至会发现有人说，一个慈爱的老师会使学习成为一件轻松的事情。但是从来没有人说过或暗示过，只有当教育成为娱乐时，学习才能最有效、最持久、最真实。教育哲学家们认为获得知识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其中必然有各种约束的介入。他们认为学习是要付出代价的，耐力和汗水必不可少；个人的兴趣要让位于集体的利益。在他们看来，要想获得出色的思辨能力对于年轻人来说绝非易事，而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
}
越是刻苦的获得，知识的积淀越深。

{
约翰·杜威曾经说过，课程的内容是学习过程中最不重要的东西。我们这里也许可以借用他的观点作为指导。他在《经验与教育》中写道：“也许人们对于教育最大的错误认识是，一个人学会的只有他当时正在学习的东西。其实，伴随学习的过程形成持久的态度……也许比拼写课或地理历史课更为重要……因为这些态度才是在未来发挥重要作用的东西。”换句话说，一个人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学习的方法。正如杜威在另一本书里写到的，我们学习我们要做的事情。而电视教育的方法是让孩子们去做电视要求他们做的事情，当然这和教室对他们提出的要求相去甚远，就像读书和看演出风马牛不相及一样。
}

一个恐怖的事实是现在的家长在教育幼童的时候，经常离不开手机。不知道是我们太过担心，成年人都难以自治，如果幼童过于依赖手机，导致注意力下降难以长期集中，会发生什么？实际上已经发生在成人身上了。
学习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因为它是一种快速走完别人艰辛摸索过程，习得别人智慧的过程，加速也不能回避掉学习痛苦本身，有些经历注定是不愉快的。课本的教育是有限的，有些必须依靠实验和实战，这些现实中的教育也都是代价不菲的，充满了荆棘和汗水。即便说现在技术的进步能够让知识展示的手段得到提升，比如更加直观，反馈更加及时等，但是依然不能去除学习过程中的不愉快。上述观点的依据是，一个问题的解决引入了其他的问题，包括知识本身变的复杂，设计教授知识过程本身的复杂，即把一个复杂的事情讲清楚本身就不容易。
想要让学习娱乐化是不可能的，自欺欺人的。初步结论如此，即学习本身多数时候都是不愉快的。我不是说反对用技术去改造教育，而是反对期望对教育和学习的不切实际的期望，即能让学习过程简单的通过玩的方式就能轻松的

应付过去。

教育的一个重要的方式是教会人们学习方法的本身，所以娱乐学习法跳过了这个过程，那么就有天生的缺陷，即只能通过某类娱乐学习学习特定的资源，但是这个缺陷需要辩证的看待。

如果通过设计娱乐的方式设计了很多知识，那么人的学习能力就会被剥夺。我举一个好玩的例子来说明这个事实，很多人现在不会开手动挡汽车，只会开自动挡汽车，汽车驾驶的门槛变低了。驾驶手动挡汽车的本领到底是不是绝对重要？现在是要打个问号。现代社会的一个特点是，过程复杂而最终用户好用的技术被少数人去独自研究，而大多数人则专门去享受这些技术带来的福利。

那么似乎能说明，可以通过娱乐的方式让某类知识和技能的习得更加容易，我们可以欣然接受社会和某家公司提供给我们的技术福利。

实际上，一个人的核心能力不能交付给被人来办，就好比吃饭穿衣上厕所不能全靠别人代办一样。学习就是一个核心能力。如果一个人要和别人不一样，那么他就应该穿不一样的衣服，起不同的名字，让别人知道他的与众不同，外在的衣服即便是买的，也要自己挑选，内在的灵魂需要构建，更需要自己精心安排。没有人怀疑学习对于自己思想和认识论的构建，所以学习

{
虽然我们无法从各种各样的建议中找出改善教育制度的方法，但大家都清楚地认识到读书和看电视对于学习的定义是完全不同的，这已经成为当今美国关于教育的重要话题。事实上，美国可以被当作西方教育第三次危机中的一个典型例子。第一次危机出现在公元前5世纪，那时雅典人经历了从口头文化到字母书写文化的变更，如果要了解其中的意义，我们应该读一读柏拉图。第二次危机出现在16世纪，印刷机的出现使欧洲发生了巨变，要了解这个阶段，我们应该读一读约翰·洛克。第三个阶段正发生在美国，这是电子革命，特别是电视机发明后产生的后果，要想了解其中的奥妙，我们应该读一读马歇尔·麦克卢汉。
}

对娱乐至死现象的反思

当下的世界在此时此刻就是最好的？

问题会层出不穷，解决了一个问题还会有无穷的问题，所以我们的崇高可能只是假的。我们希望改造这个世界，实际上这个世界不需要我可能改造。